

在深化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坚定理想信念

——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丽



▲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编者按：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新时代，红色文化被赋予哪些新的内涵与意义，伟大建党精神相关研究取得哪些新进展？如何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王炳林。

红色文化不断赓续传承、丰富发展

学术家园：您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红色文化的重要来源，但红色文化的内涵远不限于此。为什么？在新时代，红色文化被赋予哪些新内涵、新意义？

王炳林：我认为，红色文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积累的，是具有先进性的，可发挥教育人功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当然也属于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的内核是理想信念、意志品质、价值追求等。

新时代新征程上，红色文化不断赓续传承、丰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新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结晶，如脱贫攻坚精神等，在守正创新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我认为，红色文化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的强大精神与意志品质，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利于破解党独有难题，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有利于守正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富矿和持久动能。

学术家园：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您牵头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伟大建党精神及其共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系研究”，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对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意义在于什么？

王炳林：“伟大建党精神及其共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系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目前这一课题研究已进行三年多，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对学术界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尽了绵薄之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靠的是科学理论的指导，也是靠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政治品格等具有巨大鼓舞作用。

伟大建党精神来源于建党的伟大实践，其中所蕴含的党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是激励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关键所在，能够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新时代全面推进行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需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守正创新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

学术家园：《决定》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请谈谈您对此的探索与思考。

王炳林：理想信念是精神支柱、力量之源。我们应当多措并举，深入总结新时代以来党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经验，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着力构建上下协同、系统设计、全局谋划的体制机制。强化政治引领，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构建上下协同的领导管理体制；将理想信念教育同党内集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健全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长效机制；坚持理想信念教育机制、价值观培育机制、文明培育机制、公民道德建设机制的一体化探索，探索形成全社会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机制，赋予理想信念教育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注重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推进理想信念教育走深走实。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创新路径与载体，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亲和力。比如以红色教育基地为重要载体，

注入一些新的元素，找准定位、深入打造，挖掘时代价值，以生动的“教材”沉浸式地推动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入脑入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支撑。当前，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下功夫。

在强化组织保障上下功夫，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主题活动机制。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党和国家深刻规定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总体要求、基本内容、群体对象、载体手段、氛围营造和组织保障，必须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以制度和法律的力量筑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底线，不断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突出主题上下功夫，把握爱国主义教育 and 群众性主题活动本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鲜明主题，更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明主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突出这一鲜明主题，教育引导人们正确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和近代以来“四个选择”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前提与鲜明主题。

在明确主线上下功夫，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主题活动内涵。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与鲜明要求，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线归纳起来，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教育引导全社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二是教育引导人们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的主线有效构建高质量的教育内容，将

指导思想、历史教育、国情教育、红色文化教育等贯穿始终，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在创新路径上下功夫，拓宽爱国主义教育 and 群众性主题活动渠道。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更是把革命文物的教育艺术、科学的教育方法。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等增强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以网络新媒体为关键途径，推动构建网络爱国主义渠道，厚植爱国情怀。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

学术家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如何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王炳林：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是最好的教科书。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就、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研究，迫切需要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学科体系建设是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构建系统完善的学科体系要明确研究对象和内容、具有合理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具有准确的目标定位和相应的支撑条件保障。新中国史的学科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推动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同时通过合理布局设置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博士点，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为服务社会和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学术体系建设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核心所在。从知识体系和创新性观点看，新中国史研究只有透过历史现象揭示本质，把握规律，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才能形成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才能体现学科的水平。这需要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核心议题上不断推出创新性成果，同时深化研究学科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形成一部系统的中国国史学概论，对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学科特征、学科功能等作出精准描述。

话语体系建设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思想表达。新中国史的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所揭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表达系统。这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史学传统话语运用到新中国史研究之中，善于运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概念和词语表达，注重多学科话语的交流互鉴。

三大体系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能够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在资政、育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学海星光

革命文献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马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革命历史文献是革命文化的文献载体，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记载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各文献收藏单位十分重视革命文献的保存保护和开发利用，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作为头部收藏单位更是把革命文献的保存保护、整理揭示与开发利用放到重要位置，以革命文献的普查、整理出版、数据库建设、原始文献保护等原生性和再生性手段为抓手，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摸清底数、集腋成裘：编纂《革命历史文献专题书目（1911—1949）》。为了全面摸清革命文献收藏数量，国家图书馆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此项工作需要首先制定普查规则，确定数据格式和传递方式等，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门业务培训。经过前期大量努力工作，目前已汇集59家文献收藏单位的文献普查数据共计30余万条，以此为基础，组织编纂《革命历史文献专题书目（1911—1949）》。此项工作不仅是文献学意义上的版本目录、文献考据，更要求编者从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理出发，对所辑文献的意识形态进行严格把关，对各类形态的伪装本进行科学鉴别，具有非常大的研究难度。经过反复甄别、层层筛选，最终辑录1911年至1949年9月出版的革命历史图书近1.4万种，2024年4月该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战争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发挥了积极作用。

钩沉拾遗、嘉惠士林：推动珍贵革命历史文献有序出版。作为抢救、保护革命文献的有效措施，国家图书馆面向全国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组织申报“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将各文献收藏机构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化身千百倍利用。此项工作的难点在于各文献收藏单位收藏的文献浩如烟海，如何挖掘并整理珍贵、有价值的文献也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实施。此项工作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形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等系列出版物。其中的“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已出版图书138册，涉及淮海战役、各抗日根据地期刊、报纸、根据地地图、经济史料、解放区文艺文献、教育文献、中共早期新闻史料、党报党刊等，以翔实的史料和文字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脉络予以再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可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专业史料支撑，为研究者爬梳史料提供指南。

引领业界、荟萃百家：创办《民国文献研究》集刊。为进一步加强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的学术性研究，国家图书馆创办学术集刊《民国文献研究》。集刊的问世加强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的学术性、理论性研究，为及时反映国内外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在调查、整理、考证、研究、解读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进一步推动革命文献保护利用向更高水平迈进。

建章立制、有规可循：建立健全革命文献保存保护长效机制。国家图书馆在科学稳妥地开展革命文献的抢救保护工作的同时，积极推动革命文献保存保护工作机制及行业规范的制定工作。切实加大文献预防性保护力度，配置适于革命文献保护的装具和库房设备设施，推进文献保存环境达标建设，制定《民国时期文献库房建设规范》。采取分类、分级方式，成熟、稳妥的技术路线，解决革命文献普遍存在的纸张酸化焦脆等问题，开展重点文献的数字建档及酸化程度测试工作，确保文献永续传承。根据文献普查情况，对尚未进行缩微或数字化保护的红色文献进行抢救性扫描拍摄，建设国家级革命文献缩微胶片总库，并做分布式保存，实现文献内容的异质保存，确保文献内容永久安全。

革命文献保护工作是一项庞杂艰巨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和长期努力，来共同推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更上一层楼，为促进新时代文献学的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办公室主任）

传承与发展

中国当代本土建筑的原创性理念

王澐

编者按：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传承与创新”专栏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澐撰写系列文章，讲述中国建筑的传承与当代价值，蕴含着对中国传统建筑资源的深入挖掘，对西方现代建筑的价值重估，对中国当代建筑的理念探索，让传统与现代相衔接，让本来与外来相辉映。

一个严肃思考的中国建筑学者，如果想谈一下中国当代建筑的理念，有几个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关于中国的？众多现代的中国建筑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是什么？中国的城乡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对中国固有建筑之美秉持怎样的态度？

因此，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探索之后，今天来讨论一下中国当代本土建筑的理念，就要先知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发生变化和创造，“当代”一词是特别指向地方性文化的觉醒的，而且是向世界开放的。在这种意义上，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理念的讨论，将必然开始于以今天的世界为背景的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再认识，也必然伴随着对主导过去一个世纪的西方现代建筑理念与价值的重估与评判。

建筑是要让人通过可以直观、可以触摸的方式去体会，才可以感受并评判的。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否能举出一种图像，它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面貌的独特和高度？以国土的广阔和文化的多样，这几乎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概括答案的。难免想到那张我

最喜欢的中国建筑界面，即那张收藏在故宫的《千里江山图》。我开始去想，或许这张画并不只是画家的虚构，而是指向一个曾经真实的存在，一种如此美好、如此优雅的建筑文化，一种如梦境一般的世界。建筑与江山互相唱和的如画美景绵延千里，其水平如此之高，放眼世界，恐怕很少有地方可与之相媲美。

如果说这种建筑与江山的千里唱和之美是传统中国建筑大美的根源，指向世界罕见的一种国土景观系统，那么，就建筑本身而言，中国人如何在城市中处理大型公共建筑的布置，处理建筑房屋与山水、自然的关系，房屋与人的关系，就体现在建筑的基本类型——院落上。故宫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有意思的是，故宫是一组院子。宫墙之外，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也是一个院子。这是中国式的兼善之道。

从西方学院派建筑学的话语体系出发看，一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可以说有历史悠久的建筑活动，但根本没有建筑学可言，因为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建筑师这个专业角色。但从今天世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看，中国传统建筑完全是使用自然材料，以非常现代的装配式建造方式为主，几乎就是一种想象中的、关于世界未来的一种自然且真实的材料与建造

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建筑的研究受西方建筑史研究长期的影响，忽略了对乡村与园林的研究，而实际上，中国的传统乡村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建筑成就，它创造了一种不输于任何城市的建筑艺术。以现存实物来看，至少在明代，中国乡村已经实现了类似城市化的空间组织与房屋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大规模人口的非贫困状态。而中国园林，特别是江南园林，更是一种西方建筑史中从来没有编录过的极高水平的建筑，园林将建筑与自然高密度混合，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打破了建筑与自然的界限，这是整个西方世界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建筑学。

只有经过这种对中国建筑传统与西方现代建筑的价值的双重评估，中国当代建筑的原创性理念才有可能产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